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

马海涛 马国焘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准确理解和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全面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 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关注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 解决好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步伐, 使高等教育发展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相互作用; 高等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0) 01-0016-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国家开启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强国的新征程, 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来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层次影响, 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更好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准确理解和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内涵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

大论断为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提供了基本依据,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科学认识,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创新, 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但同时应该认识到, 这一重大论断不是主观偶然的, 也不是凭空捏造的, 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扬,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实践, 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科学内涵。

(一)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逻辑

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永恒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根本上回答了事物为

收稿日期: 2019-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1AZD045)

作者简介: 马海涛, 男, 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五十七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 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马国焘, 男, 中央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什么会发展的问题，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矛盾分析法”这一用来把握事物本质属性、发现事物发展规律、总结改造事物的根本方法。

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替代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2]可见，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旧的矛盾一旦结束了，新的矛盾就会不可避免应运而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规定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力量，是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矛盾。但同时，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表现就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不同，社会主要矛盾具有特殊性、相对性。可以说，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层结构，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表层结构。^[3]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永远不会消失，这就决定着，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在不断变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国家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党的八大做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是因为在当时这一主要矛盾对于其他次要矛盾来说占据着主要地位，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这一重大论断，是因为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旧的矛盾解决了，但是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理论，人民在新时代不仅仅是对生存的浅层次需要和物质文化的中层次需要的追求，更是对美好生活的高层次追求，即人的全

面发展，于是新的矛盾出现了。此时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然也不仅仅是解决落后生产力的问题，更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辩证角度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深刻解释了事物的联系与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和形式。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质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量变的过程；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的单纯量变不可能一直持续，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引起质变。同时，量变和质变也会相互渗透，总的量变过程会有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质变过程中也存在新量变的扩张和旧量变的收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同时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4]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过程中，辩证地看待其中的量变与质变。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简单是量变的问题，应该是阶段性质变，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尚未发展起来到已经发展起来所产生的变化。从“物质文化需求”到“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需求领域不仅仅追求数量上的变化，更追求质量上的变化；不仅仅追求基本需求，更追求多样化和个性需求，如更高质量的物质文化产品、更优质的社会服务、更优美的“绿水青山”、更公平的社会环境，等等，需求的内涵在延伸、层次在提升。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了供给领域不仅仅追求“人均”的问题，更追求区域、城乡的平衡、需求和供给的平衡、人和人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更新的发展理念、更有效的治理体系和更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产生的阶段性质变并没有引起我们基本国情的变化，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我们需

要继续坚持党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一些人均指标在世界的排名还不高,我们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我们还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在制定政策时应准确把握我们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现实。同时,也应认识到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一阶段性质变对我们现阶段基本国情而言虽然还没有达到能引起质变的程度,但并不是说基本国情永远不会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当我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化解了若干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走向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阶段,当我们完成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之日,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时”,此时我国的基本国情就会发生质变。

(二)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践依据

从“物质文化需求”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论述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等等。这种“需求”或是说“需要”与“社会生产”或者说“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现实中主要体现为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从这个角度分析有利于加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认识,进而有利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9]

从供给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幅提升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内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经济总量从2010年开始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与世界

第一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出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天宫、天眼等相继问世。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我们1949年以来长期供给不足的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已完全不符合“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已从供给方面基本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已降为次要矛盾,同时,新的主要矛盾自然产生。新时代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严重依赖生产要素投入而缺乏创新驱动,区域、城乡、产业之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制约因素,因此生产力提高解决了旧的主要矛盾,但生产力提高后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不了新的需求,进而成为新的主要矛盾。

从需求来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已基本得到了满足但产生了升级后的新需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精辟地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0]。中国的人均GDP从1960年的89美元、1978年的156美元提升至2018年的9770美元。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国际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一般会发生产消费升级,也就是说,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一方面对“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非物质”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而上述的这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显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辩证唯物主义讲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民是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创造者,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满足生存问题,本质上就是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人民的需求升级促进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二、全面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也客观、普遍地体现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始终。

（一）思想基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7]。事物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并且这种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相结合促进事物发展，主要矛盾的解决能够带动次要矛盾解决，次要矛盾的解决影响主要矛盾解决。因此在分析具体矛盾过程中，既要坚持重点论，也应坚持两点论；既要抓主要矛盾，也应全面看问题，重视次要矛盾。一方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用于高等教育，前者影响后者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国家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过程中，一定是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出发点，因此高等教育发展一定是围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是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服务的。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反作用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前者构成后者的解决路径。这就意味着，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和文化第一软实力重要结合点的高等教育，在承担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和传承功能的同时，一定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回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重大命题的，高等教育要通过自身深度变革实现全方位发展，在发展中提升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呼应新时代对高等教育的新期待。

（二）实践经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高等教育的变迁轨迹

1.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尚未进入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而是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包括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针对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并且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与此相对应，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既有公立、私立大学，也有教会大学，针对前述第一种矛盾，当时的政务院接管了国民政府的公立大学，并将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大学；针对第二种矛盾，政务院接管了受外国津贴资助的教会大学，收回了教育主权。可以说当时高等教育变革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同向同步的，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之后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56年至今）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有重点地进行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建设。可以说高等教育发展是具有前瞻性的，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讲话中就提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之后的院系调整，拆分了之前的综合类大学，调整产生了大批以工学院为主的专门学院，注重了区域布局，迅速满足了国家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完成了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阶段高等教育的前瞻性布局促进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使高等教育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校规模和招生人数持续扩大，办学效益不断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认识上的偏差，第一次偏差出现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脱离了经济规律和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党的十一届一中全

会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应地，国家教育政策也出现了失误，在国家“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教育政治化倾向严重，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下曲折发展。第二次偏差出现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强调，“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中去”。高校开始取消高考招生制度，并采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制度。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1966—1977年高等教育功能基本缺失，国民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过去阶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并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正确提出了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落后生产力的问题，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8]，科教兴国战略被确定为国家战略，相应地，高等教育从政治化教育逐步转变为现代科技教育，本着为国家经济建设储备人才和提供支持的目的，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包括恢复和确立全国重点高校、遴选国家急需重点学科、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进行高校扩招、开展高等教育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是以有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指导，配合了不同时期国家经济社会不同需求，在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高等教育的整体大发展。

三、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党的十九大在明确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变化后进一步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全国人民对高等教育寄予的殷切期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要实现内涵式发展，必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由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内涵式发展既包括宏观层面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解决高等教育政策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相适度的问题，又包括微观层面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解决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相适度的问题。

（一）宏观层面重点解决好不平衡的问题

作为人口和教育大国，我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庞大而复杂。目前，高等教育应着力破解改革开放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外延式发展带来的宏观层面不平衡不充分尤其是不平衡的问题。

1. 发挥财政功能，着力破解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据统计数据，在39所“985工程”高校和112所“211工程”高校中，东部地区分别为26所和71所，占比分别为66.7%和63.4%，中部地区分别为6所和7所，占比分别为15.4%和15.2%，西部地区分别为7所和24所，占比分别为17.9%和21.4%。^[10]即使在2017年国家实施“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不平衡问题依然没有明显改观。政府除应从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角度做好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外，还应发挥政策杠杆作用，从国家高等教育公平、协调发展出发，将高等教育资源向均衡增长转变，通过公共财政重点支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校

的支持力度，提高中西部地区高校的办学水平，通过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平衡促进高等教育平衡，通过高等教育平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 实现分类管理，着力破解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平衡问题

因为扩招或升格导致高校数量增多但发展层次偏低、办学质量不高。我国近 2600 所高校中，1300 多所高等职业院校基本都是 1998 年后发展起来的，且大多由中等职业学校升格形成，1200 多所本科院校中有 600 多所是 2000 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它们大多由高等职业院校升格形成。^[11] 这一情况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经济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比如教育质量水平有待提高，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变化能力不强等。具体而言，应加快高等教育分类管理进度，按国际经验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院校一般呈“金字塔”型分布，应将本科院校明确区分为研究型和应用型院校，同时加大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力度，进而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建设，引导不同高校在各自层次争创一流，满足经济建设不同需要和人民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3. 鼓励特色发展，着力破解高等教育发展生态不平衡问题

因为自身发展和争取办学资源需要，高校往往按“大而全”的外延式方向发展，在专业设置、办学层次、培养目标、大学文化等方面同质同构问题严重，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生态不平衡。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高等教育特色不甚鲜明，导致“千校一面”“生产过剩”，不可能培养出经济社会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更不可能满足人民对各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而言，应采取必要的政策调控和资源倾斜，鼓励和引导高校根据自身条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走特色发展之路，满足人民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大力发展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同时，应重视人文学科发展，发展人文学科是文化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其对整个高等教育乃至整个国家有重要“滋养”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方面不可或缺。

(二) 微观层面重点解决好不充分的问题

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目前，高等教育应在推进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着力破解立德树人方面存在的平衡不充分尤其是不充分的问题。

1. 完善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明确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这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指明了方向。但目前，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缺失严重，内部治理结构不够优化，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等问题比较突出。高校应坚持“中国特色”和“现代大学制度”的高度统一，在实现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分离的基础上推进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正确处理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关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改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大学制度的“灵魂”是大学文化和制度文化，^[12] 现代大学制度既包含显性的文件制度，也包括隐性的文化制度，应特别强调大学文化建设，尤其是制度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的基础，应发挥好文化在制

度建设中的长远性和根本性作用,擦亮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大学最鲜亮底色,发挥好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制度建设中的指方向、聚力量作用。

2. 深化以教师发展为中心的人事制度改革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人才培养关键靠教师,高等教育发展要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来支撑。但目前,部分教师素质能力难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需要,学科团队服务国家急需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限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政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国务院“放管服”要求,完善高校教师宏观调控机制,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鼓励高校在编制、聘用、考核、薪酬、晋升等方面结合不同情况探索不同办法。高校应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的要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以人才梯队建设为抓手,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以关怀激励为保障,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完善多层次人才支持体系,健全考核和薪酬激励联动机制,充分激发人才活力,打造人民满意的一流师资队伍。

3. 健全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学生为中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在高等教育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根本途径。但目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依然不足,教师重科研轻教学情况普遍,低质量“水课”依然泛滥的问题比较突出。高校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结合自身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找准人才培养目标,深化学科专业改革,优化课程体系 and 教学内容,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同时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13]

参考文献:

- [1]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07.
- [3] 颜晓峰.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9, 23(02): 5—13.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7.
- [6]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002. 60.
- [8] 教育部网站.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EB/O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82.html.
- [9] 袁占亭.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证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9, (12): 7—9.
- [10] 申怡, 夏建国. 论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不充分”及其破解路径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 (1): 10—12.
- [11] 别敦荣. 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 (6): 6—14.
- [12] 王绽蕊.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愿景、任务与路径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8, 16(4): 5—10.
- [13] 钟秉林.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高等学校内涵建设的核心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 34(11): 71—76.

(责任编辑 刘红)

(下转第43页)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u Hongyi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pgrade the TCM development forma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to meet the new demand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CM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is context, construct a new TCM personnel-training format that matches with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uild a new model to train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TCM healthcare industry, and deepen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TCM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is way, we can fulfill the goal of “inheriting the past, transmitting the legacy and giving to the future”.

Key words: TCM personnel training;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ymbiotic coupling

学
员
论
坛

(上接第 23 页)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a Haitao Ma Guotao

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has evolved. What we are now faced with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change objectively requires us to accurately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fully grasp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airness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ccelerate the pace of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an fundamentally meet the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meet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Key words: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ing Chinese society; Interac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